



上海出版资金项目
Shanghai Publishing Fund



A History of Chinese
Epigraphy

王宏理 著

中国金石学史

下



上海出版资金项目
Shanghai Publishing Funds

*A History of Chinese
Epigraphy*

王宏理 著

中国金石学史

下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三编 三国两晋南北朝金石学

自三国鼎立至南朝灭亡,先后约三百七十年。其中公元220年曹魏代汉,凡历五帝四十六年。蜀汉自221年刘备称帝至刘后主灭国,凡历二帝四十三年。东吴自222年孙权称王,凡历四帝五十九年。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朝,十五年后统一全国,316年为匈奴贵族所灭。司马睿在南方重建东晋朝,两晋凡历十五帝一百五十六年。西晋之后,北方与巴蜀之地先后有十六国建立政权,凡历一百三十五年。北朝自北魏至分为东、西魏,又续之以北齐、北周,最后为隋所灭,先后凡一百四十二年。南方自刘宋代东晋立国,经齐、梁、陈至为隋统一,凡一百六十九年。

此期正是中国历史上动荡最激烈、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思想极其活跃的时期。尤其是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佛教有关的石刻得以蓬勃发展。

自曹丕称帝至司马氏代魏立帝此近半个世纪中,战火蔓延全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真可谓“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社会经济遭受极惨重的破坏。由此,丧葬的主要特点,则表现为简单化。而头脑清醒的统治者,也理应提倡节葬。其中曹氏父子便是此期薄葬的先导,后世帝王也力戒侈靡。据《宋书·礼志二》记载,曹操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并禁立碑。魏文帝曹丕也自作终制,令其寿陵因山为体,无封无树,无立寝殿,通神道。魏明帝曹叡虽欲厚葬,但先帝遗命不敢违。而晋宣帝司马懿则于首阳山预为土藏,不坟不树,并作终制,令敛以时服,不设明器。之后各朝帝王也多提倡简约。

或以为远在南方的蜀汉、东吴多侈靡,然《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先主刘备死,丞相诸葛亮即对后主刘禅说:“百寮发哀,满三日除服,到葬期复如礼。其郡国太守、相、都尉、县令长,三日便除服。”同书《诸葛亮传》,又载诸葛亮死,也遗命曰:“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其他如大将军费祎、邓芝家无余财,光禄大夫譙周不受朝服,薄棺殓葬,亦见时尚俭约。

东吴帝王未见俭约事,但以下将相多生平节俭。陆逊、鲁肃家无余财,诸葛瑾、张昭等皆遗命葬以素棺,殓以时服。

此期墓葬制度,大致沿袭汉代,但渐趋简化。曹魏之时,已少有规模大而雕刻精之画像石墓。其他如壁画墓等也如强弩之末。墓葬石刻等不多见,碑、志甚少,墓冢常可见者为铭文砖与印章之类。

而在东吴之地,较大型的多室墓中,常有砖质、铅质的买地券压在棺下。此类墓葬

文字对考证墓主姓名、身份与卒葬年月最为直接。而于随葬的陶瓷类明器中,也可偶见有关的铭文。

西晋前后,墓室结构有较大变化,如一些大型墓葬,室内四隅砌有角柱,或在甬道处设一至几重石门。此类墓中常设有大型碑式墓志。这类形制的墓志,十六国前凉时在甘肃武威也有所见。东晋墓室形制各异,墓砖纹饰也渐趋复杂,并出现大面积拼砌的砖画。晋室东渡,豪门士族墓中常可见以砖为主的砖、石墓志,而依一些宗族墓葬的墓志,几可列出墓主的世袭表。

东晋以降,南方厚葬之风时禁时开,至梁天监六年,朝廷申明凡墓不得造石人碑兽,唯听作石柱记名位而已,可见其时常有逾规之举。以今日地面遗存所见,南朝各代帝王陵墓多有各类石刻。

此期更有一明显特征是,随着佛教文化的影响并深入,不仅如佛教造像及碑记等专门的佛教石刻大量出现,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普通墓葬石刻。又,三国时墓碑等墓前石刻极少,其他如皇统礼教等有关石刻则见增长。随着钢铁工具的普及,崖壁上的镌刻也渐显普遍,则纪事性的摩崖石刻与佛教类摩崖石刻可谓交相辉映。

第一章 墓前石刻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的开头一句，真点穿了这段历史。汉末天下大乱，后有三国。社会动乱，经济凋敝。曹操、曹丕下薄葬令，一是出于民本思想，二也是因了天下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盗之墓。故几代的皇家陵墓，多因山为体，无封无树，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葬于南京富贵山的东晋末代皇帝恭帝，将墓圻选在两山峡谷中，葬后用土填上，使与两山齐高，自然难知葬处。不过要把山谷填平，亡国之际，人力物力不可想象，可见统治者首先还是怕被盗，而非节葬。社会稍加安定，天下一太平，统治者马上忘乎所以，又开始大肆经营陵墓。所以在北朝南朝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墓前石刻马上繁荣起来。

第一节 墓碑

三国的墓碑残留至今日的极少，前人言“蜀汉无片石”，此“石”若指墓碑，以今日所见，确非虚言。而曹魏、孙吴之碑可为代表者，也只有《范式碑》、《谷朗碑》等几通。

曹魏太和五年(231)有一《曹真碑》，已残断，有阴。据清人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言，曹真祠碑在北邙山，此碑出西安。盖曹真有功于陕，故雍州吏民思其德而立此以颂之。按，北邙山在洛阳，汉魏以降，为王侯公卿的茔葬之地。据《三国志·魏书·曹真传》：“(曹)真病还洛阳，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谥曰‘元侯’。”可见曹真墓确在洛阳。依上，此碑应该是德政碑。虽残缺较甚，然可窥其体例，与东汉之墓碑相似，可资参考。

原立于山东任城的曹魏青龙三年(235)《范式碑》也残断,仅存上截。据《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2册所载拓片,此碑额高50厘米,宽27厘米。碑阳高100厘米,宽67厘米。阴高81厘米,宽50厘米。碑额竖二行,阴篆“故庐江太守范君之碑”九字,风格与后汉相似。碑文为隶书,铭文作四字句,二句一韵,三韵一换,但不规则。碑阴作四列,记树碑者姓名,未述爵里。

湖南耒阳所出孙吴凤凰元年(272)《谷朗碑》(图3·1·1)较完整,石高176厘米,宽72厘米。题额竖书一行,为“吴故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十一字,阴刻,与碑文皆作隶书,但在形体与笔法上皆近似楷书。序文无首题,“府君讳”名某字某籍贯后,言某某后代,再述“其先”,复述生平履历,与前代体例无异。序中多韵文,后汉碑中也曾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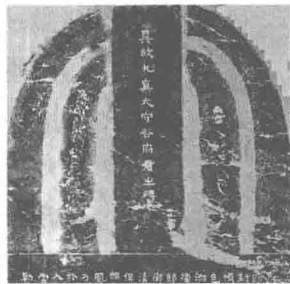


图3·1·1

两晋之碑,如今见之也少。道光末年山东掖县所出西晋泰始六年(270)《郭休碑》为晕首,额上刻有神禽异兽,篆额4行16字,阴刻,作“晋故明威将军南乡太守郭府君侯之碑”。原在山东新泰,今藏泰安岱庙的西晋泰始八年(272)《任城太守夫人孙氏碑》,其碑额竖题三行,前二行各四字,末行三字,作“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阴刻隶书,唯“之”字作篆法。按,自汉以来,为女性立碑较少,故此碑极难得。而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出于云南曲靖的《爨宝子碑》,高190厘米,宽71厘米。题额取横式,竖五行,行三字,作“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为带隶意的楷书,阴刻。

以上数碑似皆无首题。序文所述内容次第也一仍旧制,而《郭休碑》与《爨宝子碑》多韵文,有如汉赋。铭文首作“辞曰”,以下为四字句,无例外。末多有立碑年月。《郭休碑》作“泰始六年二月丙子造”。《爨宝子碑》作“大亨四年岁在乙巳四月上恂立”。按,其时年号更换无定。东晋安帝元兴元年即公元402年,但此年三月仍称上一年年号即隆安六年,寻改大亨。次年又改元兴二年,即大亨四年实为新年号的义熙元年。又,“恂”不知有何特殊之义,恐为“旬”字之误。

《郭休碑》碑阴题名甚多,多称故吏某地某姓名字某,或称义民某地某姓名字某。末后又有“郡领县八户万七千百三十”、“兵三千人”、“骑三百匹”、“部曲将三十四人”等,其属下官兵百姓似皆列于斯。《爨宝子碑》题名也多,然皆言主簿、录事等官及姓某名某,未及籍贯。

南朝之碑，据文献所记与陵墓前石刻遗存推想，当为数不少，也必精美，但也正如清代孔尚任《桃花扇》传奇所唱，“鸽翎蝠粪满堂抛，枯枝败叶当阶罩。谁祭扫，牧儿打碎龙碑帽”，陵园终有败落之日。南朝梁之陵墓前石刻残留不少，墓碑除萧憺萧秀墓前碑文尚可辨识，余皆漫漶或已无存。今姑以较高大的二碑为例：



图 3·1·2

立于云南陆凉的刘宋大明二年(458)《爨龙颜碑》(图 3·1·2)，与上述著名的《爨宝子碑》史称“二爨”。高 338 厘米，上宽 135 厘米，下宽 146 厘米。圆首碑，上端有螭龙类珍禽异兽。有穿，穿在额下，穿左右又似有二穿形。题额六行，行四字，阴刻楷书，“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按，汉时尊称刺史为使君，汉后州郡长官也有此称，但碑额称“使君”者少见。

今在江苏南京的梁普通三年(522)《萧憺碑》，高 560 厘米，宽 160 厘米。凡三十六行，行八十六字，阴刻楷书。

二者体制庞大，志铭文字也多，《爨龙颜碑》约千余字，《萧憺碑》则三千有奇。文字雅驯，韵律讲究。试举《爨龙颜碑》中一段：

容貌玮于时伦，贞操超于门友。温良冲挹，在家必闻。本州礼命，主簿不就。三辟别驾从事史，正式当朝。靖拱端右，仁笃显于朝野，清名扇于遐迹。

二者题名也多，《爨龙颜碑》碑阴题名近五十人，而《萧憺碑》多至千人。

二碑最有特色的，是铭文后有关立碑的记录。《爨龙颜碑》于铭文后一节写有立此碑之意。后一行书长子早卒，次子某某等“建树此碑”，又一行书“大明二年”九月上旬孙辈某某等立。又一行书“匠碑府主簿益州杜茝子”，又一行书“文建宁爨道庆作”，十分详尽。

《萧憺碑》文字稍少，但更全面。此参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二六与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一的文字，对残缺者试作部分拼合：

侍中尚书右仆射宣惠将军东海徐勉造

前正员将军吴郡张明监作

吴兴贝义渊书

丹杨□贤明刻字

防郃吴兴郃元明

如此详细的记录,后世也不多见。按,参上述二书读《萧憺碑》,有些想法。由二书著录文字的不同及《金石萃编》几处大误,可想见历代碑刻浩如烟海,常人难以件件亲见,若仅据拓片,难免致误。而处于秀才不出门,可知天下事的时代,更易犯错。

《金石萃编》于《始兴忠武王碑》题下注曰:“额题‘梁故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依此题额,应指萧景,而又非是萧景碑额,乃萧景墓前石柱铭文,且反书。而萧憺的碑额,据《梁书》卷二三本传,应作“故侍中司徒骠骑将军始兴王(或称始兴忠武王)之碑”。不知《金石萃编》编者王昶为何有此失误,或王氏未亲见墓碑,而拓片又衔接有误。其误之因,在此姑作一点推测:《萃编》该卷之末《萧公神道碑额》之铭文作“梁故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侯萧公之神道”。王氏跋中有言:“此额题‘中抚将军’传所未备也。”而《梁书》本传中其实有记载:“萧憺于(天监)十八年,征为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军将军。”(按《八琼室金石补正》所录《萧憺碑》中也见“侍中中抚将军□□□□三司领军将军”)精熟经史的王昶或凭记忆而将应为萧景之碑额移至此处。也或因记忆之误,故如上引王氏言,以为萧景的“中抚将军”史传中未载。但《梁书·萧景传》末尾即云:“普通四年卒于州,时年四十七。诏赠‘侍中中抚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

《金石萃编》于碑文前先列一行:“梁故侍中司徒骠骑将军始兴忠武王之碑。”依体例,如此列法,当为碑的首题。而依《八琼室金石补正》该碑后的按语,此正为该碑的碑额。如王氏曾亲见此碑(按,据传此碑文字久已多漫灭),或亲见未经他人胡乱拼接的拓片,也不至错乱至此。

《金石萃编》在此尚有一误,即将梁安成康王萧秀碑之碑阴误作萧憺碑阴,且录文后所引之跋也误。首则引《复斋碑录》:“梁散骑常侍司空安成康王碑,故州民前廷尉卿彭城刘孝绰撰,奉朝请吴兴贝义渊正书。”既录萧憺碑,又言萧秀碑,不可通。而碑阴文字并未有关萧秀的文字,或竟连碑阴之文与复斋之语一并现成抄录而未细审也。

只因未审,故后文又列《萧公神道碑额》一则,其文字便是萧憺碑处以为该碑之额者。而视跋文,又知是讳景字子昭的吴平侯。但又对“碑额”中“中抚将军”有疑问,以

为史传中未之有,可见确为未曾细审。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序》曾言:“(《金石萃编》)编校出于众手,纰谬孔多,读者惑焉。”读者疑惑,已成事实。但如上述的错因,非“出于众手”可概括之。

按,尚有一《刘猛进碑》,陈太建四年(572)刻,据《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2册所载拓片高80厘米,宽36厘米。半圆形碑首,阴阳两面各为双龙环绕,龙首分左右下垂,突出石边。按,但不知是否碑形墓志,估列于此。又,依今日资料,知前有“前陈散骑侍郎刘府君墓铭并序”,石高81厘米,宽46厘米,为隋大业五年(609)十一月立。现藏广东省博物馆。



图3·1·3

这里有必要关注一下《好太王碑》,此碑全称为《高句丽国岗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图3·1·3),是高句丽长寿王于414年为其父即谥号为“岗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的琰德立的墓碑。碑近方柱形,由角砾凝灰岩巨石略加修琢而成,石质较粗砺,碑面不平。高639厘米,底部宽134至197厘米,顶部宽100至160厘米,碑文凿有栏线界格,四面环刻,共四十四行,满行四十一字,隶书阴刻。碑文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记述高句丽始祖的神话传说与建国经过,并简述好太王的行状;第二部分记述好太王征碑丽、伐百济、救新罗、败倭寇等史实,以张扬其南征北战广开土境的功业;第三部分记载根据好太王遗教,对好太王陵

之守陵人烟户来源和家数及有关制度。以下移录几节碑文,看其记述风格:

(永乐)八年戊戌,教遣偏师,观帛慎土谷。因便抄得莫新罗城,加太罗谷男女三百余人。自此以来,朝贡论事。

九年己亥,百残违誓,与倭和通。王巡下平穰。而新罗遣使白王云: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归王请命。太王恩慈,称其忠诚。特遣使还,告以密计。

十年庚子,教遣步骑五万,往救新罗。从男居城至新罗城,倭满其中。官军方至,倭贼退。自倭背急追至任那加罗从拔城,城即归服。安罗人戍兵,拔新罗城。盐城倭满。倭溃,城内十九,尽拒随倭。……

北朝之碑,碑身高多在2米上下。立于山东充州的北魏神龟二年(519)《贾思伯墓

碑》，据《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拓片，碑阳通高 175 厘米。发见于清乾隆三年(1783)的河南长葛东魏兴和二年(540)《敬显儒碑》高 160 厘米，宽 85 厘米。而清光绪二十年(1894)出于河北磁县东魏元象二年(539)的《高翻碑》，据拓片高 213 厘米，宽 109 厘米。

此期碑额的书刻，有其特色。清光绪末出于山东德州的北魏正始五年(508)《高庆碑》，与清乾嘉年间同出该地的北魏正光四年(523)《高贞碑》皆为篆书，阳刻，并阳刻界格。虽结体欠美观，却见刻意制作。起笔收笔的提按，十分夸张。不少笔画中间肥，起笔收笔削尖。其风格近似《说文解字》所列的古文。按，此类体前人或称作“柳叶篆”，本期墓志盖中也常可见之。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于河北磁县的东魏天平三年(536)《高盛墓碑》与上述同出磁县的《高翻碑》也皆为篆书，阳刻，并有阳刻界格。而其笔画为等粗线，结体较上者匀称，但文字也欠规范。此类风格，本期墓志盖中也常可见。

而以楷书题额的多无界格，且为阴刻。如河北唐山的北魏延昌元年(512)《杨宣(或作“晕”)碑》、上述的北魏神龟二年《贾思伯墓碑》、河北曲阳东魏天平元年(534)的《邸珍墓碑》，其文字大小稍欠匀称，唯如立于山东曲阜的北魏正光三年(522)《张猛龙碑》阴刻界格，结体也较平整。

还需提及的，有北魏景明五年(504)的《霍扬碑》，此碑立于山西临晋。其碑额下部有穿，左右各刻篆书“密云太守”、“霍扬之碑”四字。按，有穿之碑，此期已少见。其篆字如九叠文，也不多见。

此期碑额文字多作“魏故……之碑”，《高盛碑》与《高翻碑》作“魏……公碑”，少有例外。山西长子所出东魏天平元年(534)《程哲墓碑》的特别处，尤在于碑阴为造像。

至于立在山东乐安的北魏正光四年(523)《马鸣寺根法师碑》，应属塔铭。因本期塔铭多墓志形，故归此一叙。此碑的楷书额，上部竖书三字“马鸣寺”，阴刻。下部横排竖书四行，作“魏故根法师之碑”。为阳刻。

或因拓片不全不清，此期墓碑有首题的似不多见。而上述的《程哲墓碑》，又多至令人费解。其首题当作二行计，首行为“假恒农太守程定(?)宋诏、假常山太守程文静、前祭酒轻车将军给事中程四珍、假太原程□世、程进、程庆仲等造”，次行为“朔州故平北府长史程钵字洪根、故晋阳令程蠡字士琰、故高都令程买字市(?)略(?)、故赠代郡太守程府君之碑文”。按，首题第一行书此内容，可为特例，但对理解文意无碍。只是第

二行有些费解,其数“故”字无论作“物故”之“故”或“门生故吏”之“故”与末尾“故赠代郡太守程府君”皆无法联系。据所称“程府君”与正文第三行开头所述“君讳哲字子贤”,可知此系单为程哲所立之碑,且也无与上述程休、程蠡、程买同立一碑的先例。未见原碑,也未见拓片,又未见他人作何解,且存疑。

此期碑似多有铭文,且多为四字句,唯拓片影印不清,无可通读者。

第二节 墓石柱及石神兽

前文言曹操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并禁立碑。晋继魏起,曾一统天下,仍禁止立碑。但向来都有厚葬薄葬的不同风气,所以历朝都有例外与违规者,所以到南朝宋时,裴松之仍议禁断。《宋书·郑鲜之裴松之何承天传》载:

(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陈之曰:“碑铭之作,以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大者道勋光远,世所宗推;其次节行高妙,遗烈可纪。若乃亮采登庸,绩用显著,敷化所莅,惠训融远,述咏所寄,有赖镌勒,非斯族也,则几乎僭黷矣。俗敝伪兴,华烦已久,是以孔悝之铭,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时厥后,其流弥多,预有臣吏,必为建立,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贵,但论其功费,又不可称。不加禁裁,其敝无已。”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彰茂实,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虚,则义信于仰止,道孚于来叶。”由是并断。

按裴松之的观点,树碑立传多是欺世盗名的,“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不加禁裁,其敝无已”。因此,才有《隋书·礼仪志三》所记一段话:“(梁天监)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兽碑,唯听作石柱,记名位而已。”如此说来,唯有石柱可不少限制,其作用即如前面讨论的“表”的作用,也等于与墓志同一功能。

不过,凡能用石柱的,岂是普通人家。看古文献所记,除了庙堂(含寺庙)外,就是上层人士墓前才有。只是细长型石柱最易毁坏,所以如今可知的不多,能见的实物更少。魏晋之时,所记所见都极少。晋代石柱,可见酈道元《水经注·阴沟水汧水获水》记:“谯定王司马会冢。冢前有碑,晋永嘉三年立。碑南二百许步,有两石柱,高丈

余,半下为束竹交文,作制工巧。石榜云:“晋故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扬州江州诸军事、安东大将军、谯定王河内温司马公墓之神道。”虽未见实物,其大小形制与文字体例记述正确,如同亲见。如今所见实物,多南北朝者,而以南朝为多。盖南朝之时,国内相对安定,生产发展,也使墓前石刻得以发达。按,望柱(华表)至此时仍有以木为之者。《南齐书·五行志》载:“建元元年(479),朱爵舫华表柱生枝叶。”此当指帝宫南门前护城河边的望柱,其时墓前是否有以木为之不可知。

按,因如前一编所说,前人意见各异,后世学者因不辨名目与实物间复杂的关系,则著录往往有记为碑、阙之类者,或因只见残存的铭文,又因不见实物,只见拓片,则又有误认者。如《金石萃编》卷二六称梁吴平侯萧景墓石柱铭文为“萧公神道碑额”,《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十一称梁太祖建陵左右石柱铭文为“太祖建陵二阙”。卷九称晋骠骑将军韩寿墓石柱铭文为“骠骑将军韩寿墓碣”,而《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又称之为“韩寿神道阙”,今日学者或又称作“墓表”的。

依上所述,可推想出于河南安阳的曹魏时《谢君神道碑》(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2册)也应是石柱铭文。观《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2册所载拓本,此碑有阳刻方格(按,有方格者甚少),阳刻篆书,凡五行,行三字:“魏故长安典农中郎将谢府君之神道。”高53厘米,宽59厘米。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2册所载《霍君神道碑》也应是石柱。据拓片高37厘米,宽39厘米,有阳刻方格,阳刻篆书,凡四行,行三字:“魏故公丘长巨鹿霍君之神道”。

山东安丘之晋太康五年(284)《王君神道阙》未画格,阴刻篆书,凡四行,行三至四字:“晋故安丘长城阳王君墓神道。”左边有小字一行,记建造时间:“大(太)康五年岁在甲辰安丘立。”

而上述的晋永宁元年(301)《韩寿神道阙》,《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所载拓片右上又有前辈学者题为“晋南阳韩君墓神道”者(此称与铭文相同),此石柱建国后藏洛阳博物馆,石柱已残,仅存中间段,高113厘米,径33厘米,铭文上下雕有粗绳纹。凡四行,行五字,呈长方形。按,长方形者在现存铭文及拓片中极少见。其上阴刻隶书四行二十字,可惜两边残破,左右两行仅留极少点画,但可推测为如下文字:“晋故散骑常侍骠骑将军南阳堵阳韩府君墓神道”。

原出四川巴县,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晋隆安三年(399)《杨阳神道阙》,据《北京图书

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2册所载,拓片高36厘米,宽42厘米。阴刻楷书,多隶笔,凡七行,满行七字。文字作三段,一为“晋故巴郡察孝骑都尉枳阳府君之神道”,一为“君讳阳字世明,涪陵太守之曾孙”,一为“隆安三年岁在己亥十月十一日立”。按,上述“神道”后有文字者也极少见。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2册尚载有晋《赵府君墓阙》,未有年代,拓片高41厘米,宽43厘米。阴刻隶书,有楷意,凡四行,行五字,作“晋故振威将军郁林(属广西)大(太)守关内侯河内赵府君墓道”。按,称“墓道”者极少见。

南朝帝王陵墓前的石柱,据考古报告例举如下。



图3·1·4

1. 南京尧化门:梁吴平忠侯萧景墓,存一柱,完整(图3·1·4);梁安成康王萧秀墓、梁建安郡王萧伟墓;二柱皆存。
2. 南京甘家巷:梁新谕宽侯萧暕墓,存一柱。
3. 南京笆斗山:失名之墓,存一柱。
4. 江苏句容:梁南康简王萧绩墓,二柱皆存。
5. 江苏江宁:梁建安敏侯萧正立墓,二柱皆存,然已残;失名之二墓,各存一柱,皆残;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墓,二柱皆存,然已残。
6. 江苏丹阳:齐武帝萧赜景安墓,存一柱础;梁文帝萧顺之建陵,二柱皆存。

南朝陵墓前的石柱,注重雕饰,大致情形如此:一般通高6米以上。分柱础、柱身、柱身圆盖三部分。柱础分二层,下为基石,多呈方形,边长1.5米以上。四周刻动物类浮雕。上层刻有翼的怪兽。柱身圆形,刻瓜棱直线形条纹,凡二十四至二十八条。上端竖嵌一扁方形石板,石板宽1米左右或以上。比上述前期者明显较大。上刻“某某之神道”等铭文。石板下也刻有多种花纹图案。柱首圆盖往往作圆形莲花座,座上立一小石兽,形如辟邪。按,前代墓石柱的形制恐无大别,而据残留有关部件尺寸与前人著述,或未有此期高大,矮小者或仅有此一半高度。

陵墓前石刻发展到一定规模,自然产生必要的制度。如酈道元《水经注·洧水》记汉弘农太守张伯雅墓:“庚门表二石阙,夹封石兽于阙下。冢前有石庙,列植三碑。……碑侧树两石人,有数石柱及诸石兽矣。……”此类记载不少。按,陵墓前石刻皆置于墓前神道两旁,每类皆两两相对,或可至四对。如上述萧秀墓有石辟邪二、石碑二、石柱二,南京栖霞山梁桂阳简王萧融墓也有石辟邪二,萧伟墓有石柱二,萧绩墓石有辟邪、石柱各二,等等。可推知萧景墓、萧暕墓及一些失名之南朝墓前石柱皆非单柱独

立,也应两两相对立于神道两旁。

石柱铭文多简洁,体例也无大别。如梁文帝建陵之石柱题“梁太祖文皇帝之神道”,萧景墓石柱题“梁故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萧秀墓石柱题“梁故散骑常侍司空安成康王之神道”,江苏江宁梁建安敏侯萧正立墓石柱题“梁故侍中中左卫将军建安敏侯之神道”。

南朝墓石柱铭文书刻有一个特点。上述晋太康五年(284)的《王君神道阙》,左右石柱二铭文排列完全一致,皆自右至左竖行书刻,末尾即左边落一行小字款,文字皆同。而南朝石柱铭文往往于神道左侧者右行文,神道右侧者左行文。而看《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所载梁新渝宽侯《萧暕神道西阙》,铭文自左至右,即可知此石柱原本置于神道右侧,亦即西侧,故有上述的定名。

又有二石柱皆作反书或一作正书一作反书者。据记载,梁文帝萧顺的建陵前二石柱即一为正书一为反书,江苏南京梁普通四年(523)吴平忠侯萧景墓前仅存一石柱,也为反书(图3·1·5)。按,所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收录者为正书,文字说明言“反文正书”。



图3·1·5

按,此期也有作异制者,如河北易县(今作定兴县石柱村)北齐太宁二年(562)之“义慈惠石柱”(又名“北齐石柱”)。此柱通高665厘米,分柱础、柱身、石屋三部分。柱础部分与上述者大致无别,而柱身为不等边八角形,柱身往上略收小,至通高四分之三处,颂文与题名刻在此处。石屋建于柱顶,为一正面三间、进深二间的单层四阿顶小屋,石屋内正面当中一间刻佛像一区。北魏末年,镇守北方的士兵与百姓造反,与朝廷官兵交战于易县一带,战后收拾残骨,在集中埋葬处立木柱以为标记。越三十余年,北齐武成帝下旨改立石柱,故有长达四千余字的颂文与众多题名。

上文已说过,虽历代提倡薄葬,但不少帝王对自己往往不薄,墓前石刻就是明证。只是北方的陵墓少有发现,而南朝相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奢靡之风又兴,所以南朝陵墓的石刻也特别兴盛。这里就集中谈一下南朝陵墓石兽。

江苏南京附近(及江苏江宁、句容、丹阳三地)集中着大量南朝帝后王侯陵墓,其中

三十余座有残存不同情况的石刻。除石碑以外即是石柱、石兽，完整的一般是各自一对。现存有石辟邪的有齐豫章文献王萧嶷墓、梁吴平忠侯萧景墓等十三处，现存有石麒麟的有宋武帝刘裕初宁陵、梁武帝萧衍修陵等也有十三处。由此，也可看出王侯墓前为辟邪，帝后陵前为麒麟。

按，学界一般认为无论哪种石兽，都有双翼，故为神兽。而细作区别，有无角有角之分，无角为辟邪，有角的又分单角和双角，单角为天禄（或叫天鹿），双角则为麒麟。此说法之来由，以其所参考的文献看，似乎不甚可靠。《汉书·西域传上》“乌弋山离国”下言：“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后三国魏人孟康注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师子似虎，正黄有髯，尾端茸毛大如斗。”加一“或”字，可见是不十分确定，但对后人讨论问题总是个依凭。这些波斯帝国的品种，国人一般难见真容，不能准确说明也不奇怪，不然也不会有后世不同的说法。但关键的一点是这种称“桃拔”的动物有其特征，“似鹿，长尾”，而细分的区别是，独角为天鹿，双角为辟邪。即二者形体相像而区别在角。再回头看二编所提河南南阳东汉宗资墓前有大型石雕天禄与辟邪，其躯体长，可以为特征符合。其他如洛阳伊川出土的石辟邪与洛阳涧西孙旗屯乡防洪渠所出石辟邪，皆东汉时物，也符合这一特征。

但问题是，如今所见南朝王侯墓前的所谓辟邪，是身体雄浑粗壮如狮子之形，而帝后陵前的所谓麒麟则如东汉的天禄（天鹿）、辟邪，身躯略细长而近鹿形。《梁书·武帝纪下》载：“中大同元年（546）春正月丁未，曲阿（唐后始称丹阳）县建陵隧口石骐驎动，有大蛇斗隧中，其一被伤奔走。”帝陵前的石神兽，的确是称“骐驎（麒麟）”的。不过，《建康实录》卷十七“高祖武皇帝”下却说：“十二年正月，改年为中大同元年。曲阿县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有大蛇斗隧中，其一被伤奔走。又青虫食陵树叶俱尽。”而从二书编撰时代看，前者是初唐，后者是中唐。从行文上看，是有相承关系的，但为何一称麒麟，一称辟邪呢？可能性有两种，一是本身概念不清，时人随意称呼，二是后者纠正前者说法。若是第一种，以前文说法，也属正常，而若是第二种可能，则便是说明南朝时与东汉时的定名还是认可的，亦即南朝还是沿袭了东汉的叫法，即帝后陵前的称麒麟。那王侯墓前的又叫什么呢？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羊虎”条：“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塋，如生前之象仪

卫耳。”若以此对照，则近似石虎。但其所谓“秦汉以来”，似过于笼统，难以对号入座。

《水经注》中记载石虎的不少，但有卷三十一“泄水”下这样的记载：“彭水迺其西北，汉安邑长尹俭墓东。冢西有石庙，庙前有两石阙，阙东有碑，阙南有二狮子相对，南有石碣二枚，石柱西南有两石羊，中平四年立。”说明石虎外是有石狮子，而且唐代帝陵前很多确有极写实的石虎。我们再回头看《水经注》卷二十八“沔水中”：“蔡瑁冢，冢前刻石为大鹿，状甚大，头高九尺。”这“大鹿”应该就是“天鹿（亦即天禄）”。有天禄，有狮子（按，上文孟康注也和天禄、辟邪一起同时提到了“狮子”）。虽然没有麒麟、辟邪，那南朝王侯墓前何以不能按造型称为是石狮子呢？按一般的资料所说，当地百姓是称狮子的，当地地名也多有以“狮子”命名的。所以，若按东汉的习称，帝后陵前称天禄即可，王侯墓前也可直接称狮子。当然，此中多出一“麒麟”。按，许慎《说文解字·鹿部》：“麟：大牡鹿也。”“麒：麒麟，仁兽也，麋身，牛尾，一角；麇（麟），牝麒也。”按现在的说法，麒麟的原型是长颈鹿，而这里说“牡鹿”，只是将鹿分公母的具体叫法。至于“麒麟，仁兽也”，则便是古人所想象创作的神兽（上述各种动物都有双翼，本身也都经神化）。而看其形，与上述孟康注“一角者或为天鹿”也就基本无别了。则又可反过来说，“天鹿”即“大鹿”，和《说文》也有相通处。亦即天禄、麒麟是一物。若此，帝后陵前称天禄并细分作母天禄公麒麟即顺理成章了。至于狮子，是西域传入中原的罕见动物之一，看《后汉书·西域传》所记，也多处提到各国遣使贡献。狮子人称百兽之王，而在佛教故事里，佛祖释迦牟尼降生时，即作“天上地下，惟我独尊”的狮子吼，狮子又是文殊菩萨的坐骑。如此神化了的威严而震慑万物之神兽，自然有镇魔、避邪的神威，从另一面看，亦即有吉祥之意。则在佛教盛行的南朝，与罕见动物天禄、麒麟同列陵墓之前，更是自然之事。所以，不少学者也坚持王侯墓前者称石狮。

且看齐武帝萧赜景安陵石刻。景安陵位于江苏丹阳建山乡田家村。陵前墓前只剩有一对石兽。东边为天禄（图3·1·6），西边为麒麟。天禄身长315厘米，高280厘米。端庄而秀逸，威严而沉稳。直颈高扬，双目圆突而平视前方，宽口大张。鬃毛与双翼等多作浅浮雕，胸前与臀部有翎毛状卷云纹浮雕。按，比照陈文帝永宁陵的石兽，此纹饰应为颌下所垂几缕须髯的



图3·1·6